

2009 后记

--为什么 1996 年我在台湾要写「性革命」这个主题

活在 1990 年代台湾性革命之后的年轻人，其实很难想像台湾历史性革命前后的差异；现在人们越来越不把婚前性行为、同居、未婚怀孕、一夜情、女性情欲主动、女性谈论情欲等等当作污名，甚至至少在表面上把尊重同性恋或跨性别当作理所当然该做的事情，这些都是台湾性革命之前不可想像的。1994 年卡维波写〈一场性革命正在发生〉，就是要捕捉解读当时性革命的迹象与趋势，但是如何从理论观点上看待台湾的性革命则是我这篇论文要解决的问题。

我所采取的途径是从西方性革命的历史，去解释性革命的发生、去观察性革命所累积的政治效应。20 世纪初期像赖希这类活跃的西方性学家，带动了性改革的社会运动，当时曾被人称为「性革命」；不过到了 1960-70 年代，西方的妇女解放、同性恋解放运动，以及反文化运动中的 free love，这些被称为「性解放」的趋势构成了现在大部分人所知的西方「性革命」，也确实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性的看法。然而许多人对于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没有像面对其他社会革命一般，加以历史的、理论的分析，反而只是像女性主义者 Sheila Jeffreys 那样，政治性的对性革命采取简化而负面的批判观点（*Anticlimax :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UP, 1991）。事实上，认为性革命是「失败的」、「危险的」、「过时的」等等评价，常常成为舆论惯用的主流说法，在台湾也很流行。我的文章则是

针对这样简化的价值评断，提出纵深横跨的历史社会分析，用理论的解释来说明性革命的发生和效应，用揭露酝酿冒泡中的根本社会矛盾，来激化社会的革命。

我个人因为身在其中而未能充分自觉的历史镜射是：其实 1990 年代在台湾与西方，都是性运动全力冲刺的年代。西方酷儿在爱滋危机中越挫越勇，中国大陆的性革命则也是潮流汹涌（参见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到了 21 世纪，因为网路等传播科技对于新的性文化之推波助澜，更根本地改变了全球的性文化，固然同时引发了保守派的歇斯底里立法打压与反挫，至今仍在拉扯与交锋中，但是此刻回顾性革命的遗产，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今日人们已经难以否定过去性革命的成果。

我的论文所揭示的「如何看待社会矛盾」的问题，今日依然十分重要，因为「否定性革命」的那种思考逻辑，仍然存在于今日的其他议题中。例如许多看似政治不正确、冒犯大众与主流的个人突破性实践，不但被保守者污名入罪，也被政治正确挂帅的性别言论所谴责否定，而忽略了这类实践可能如何激化社会矛盾。这篇文章想要带给读者的启示也就是：我们需要借着社会与历史的分析，来认清如何与为何要把性革命进行到底。